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Anthony
Giddens

民族-国家
与
暴力

安东尼·吉登斯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学术前沿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民族-国家与暴力

[英] 安东尼·吉登斯 著

胡宗泽 赵力涛 译 王铭铭 校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 - 国家与暴力/(英)吉登斯著;胡宗泽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5

(学术前沿)

ISBN 7-108-01140-9

I . 民… II . ①吉… ②胡… III . 国家理论 IV . D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0786 号

责任编辑 舒 炳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

印 刷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张 13.625

字 数 300 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21.80 元

学术前沿

总序

DZ 16/23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素来重视国外学术思想的引介工作,以为颇有助于中国自身思想文化的发展。自80年代中期以来,幸赖著译界和读书界朋友鼎力襄助,我店陆续刊行综合性文库及专题性译丛若干套,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良好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世界格局的急速变化,学术思想的处境日趋复杂,各种既有的学术范式正遭受严重挑战,而学术研究与社会一文化变迁的相关性则日益凸显。中国社会自70年代末期起,进入了全面转型的急速变迁过程,中国的学术既是对这一变迁的体现,也参与了这一变迁。迄今为止,这一体现和参与都还有待拓宽和深化。由此,为丰富汉语学术思想资源,我们在整理近现代学术成就、大力推动国内学人新创性著述的同时,积极筹划绍介反映最新学术进展的国外著作。“学术前沿”丛书,旨在译介二战结束以来,尤其是本世纪60年代之后国外学术界的前沿性著作(亦含少量二战前即问世,但在战后才引起普遍重视的作品),以期促进中国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反思,并回应当代学术前沿中的重大难题。

“学术前沿”丛书启动之时,正值世纪交替之际。而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历经百余年艰难曲折,正迎来一个有望获得创造性大发展的历史时期。我们愿一如既往,为推动中国学术文化的建设竭尽绵薄。谨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年11月

目

录

导论 1

第1章 国家、社会与现代史 (7)

 权力与支配 7
 国家的概念：初步的评论 18
 社会理论中的国家、民族－国家和军事力量 24
 对现代史的非连贯性解释 34

第2章 传统国家：支配与军事力量 (43)

 传统国家中的城市和乡村 43
 监控与行政力量 50
 领土权、国家和社会 59
 传统国家的军事力量 64

第3章 传统国家：官僚制、阶级和意识形态 (79)

 官僚制与阶级统治 79
 意识形态与非现代国家 90
 国家体系 98

第 4 章 绝对主义国家与民族 – 国家	(105)
绝对主义国家体系	106
作为组织的绝对主义国家	115
绝对主义国家向民族 – 国家转换过程中的军事力量	127
民族 – 国家、民族和民族主义	140
第 5 章 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和社会转型	(154)
什么是资本主义?	154
资本主义与工业主义	171
第 6 章 资本主义与国家:从绝对主义到民族 – 国家	(185)
商品化与国家的发展	185
资本主义与世界体系理论	199
第 7 章 行政力量与内部绥靖.....	(213)
行政力量之一:通讯与信息储存	214
行政力量之二:内部绥靖	222
都市化、域化和隔离	233
第 8 章 阶级、主权和公民权	(242)
多元政治	242
多元政治与公民权	245

公民权、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	253
第 9 章 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军事工业化 (269)	
“长久的和平”	269
战争与社会变迁	279
世界大战	282
民族－国家、工业主义和武装部队	290
第 10 章 全球国家体系中的民族－国家 (305)	
民族－国家与“国际关系”的创建	307
民族－国家的类型	316
世界资本主义经济	325
国际秩序和国家主权	330
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和国家体系	336
第 11 章 现代性、极权主义和批判理论 (345)	
极权主义：监控和暴力	346
现代性的维度	361
探求一种规范的暴力政治理论	374
20 世纪晚期的批判理论	384
参考文献	(395)
译后记	(425)

导 论

本书是我所著的社会理论三部曲^{*}的第二卷。这三部著作所关注的均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世界之间的关联，但它们无意于再度参与现存对马克思著作所做的没完没了的批判性解剖，它们所试图勾勒的是，后马克思主义对当今社会和政治所作分析的轮廓。马克思的著作对于理解影响现代世界之塑造的那种无所不在的力量至关重要。这种力量当然就是资本主义（capitalism），它被认为是一种含有比此前的任何一类生产秩序都远为巨大动态扩张趋势的经济企业模式。可是，资本主义却并非是塑造现代性（modernity）的唯一力量，而且人们无论如何总有难以辩驳的理由，使自己不满足于马克思用以描绘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主要视角。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之既有缘起和未来命运所作的讨论，是其只具有有限解释力的总体历史图示的一部分。若要评价其对资本主义企业特征的洞见，就必须将它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框架区分开来，与此同时，又必须吸收另一种不同的历史研究取

* 该三部曲的第一卷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第三卷为《超越左与右》(Beyond Left and Right)。——译者注

向和现代制度分析方法。如果我们把现代社会当成是生产力渐进增长过程的巅峰,那么就不能揭示出现代社会同各式各样的传统社会之间的差异。现代“社会”是立存于民族－国家体系中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s),而传统国家(traditional states),即我称之为“阶级分化的社会”(class－divided societies),在其内部特征及其相互之间的外部关系方面,均与现代社会有着非常本质的区别。社会科学家们习惯于把“社会”看成是具有明确边界的行政实体,这种看法并不符合阶级分化的社会,而倘若它比较符合现代社会的话,那么一般而言,这并不是因为,具有明确边界的行政实体是社会联合所固有的一切属性,而是因为,它是与民族－国家相伴随的独特社会整合形式的产物。

历史唯物主义把传统国家和现代国家的诞生都与物质生产,即我称之为“配置性资源”(allocative resources)的发展联系起来。然而,为了协调臣民而展开的信息收集和储存却与物质生产同等重要。而且,信息的收集和储存还频繁不断地成为物质财富生产的主要手段。对于那些其时－空范域比部落文化远为广大的社会体系来说,信息的储存在“权威性资源”(authoritative resources)的建构过程中,至关重要。而监控(surveillance),即对信息的控制以及一些群体对另一些群体的活动所进行的监督,反过来又成为权威性资源得以扩充的关键性因素。

在本书中,我还对军事力量在传统国家和现代国家的组织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给予了大量的讨论。由谁控制着暴力工具,这种控制的完备程度如何以及实施这类控制的目标何在,在所有拥有“武装力量”的社会中,均至关重要。不过,19世纪以及当今最有影响的社会理论流派(包括马克思主义)的题域,很大

程度上却恰恰未包括监控以及暴力工具控制这类现象。诚然，要研究这类现象，我们就必须结合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关注点——资本主义和阶级冲突。但与此同时，监控以及暴力工具控制这类现象，还是影响现代性发展的独立变量。

除此之外，还存在着与现代性有关的第四种“制度丛结”，这就是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于这一现象所带来的冲击和后果的认识，是含混不明的。社会理论中的一个主要争论点在于：某些学者视资本主义为现代世界的“缔造者”，而另一些学者却将这项可能会招致怀疑的成就归功于工业主义。因而，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扩张以及对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所作的解释相对立，存在着“工业社会理论”。根据“工业社会理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其实均不过是现代社会生活中工业生产主过程的微小变异而已。可是，在很大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工业社会理论”却是错误的，因为尽管工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的刺激下得以发展的，但就其各自的特性及其所导致的社会后果而言，工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却存在诸多差异。

20世纪的世界是一个充满血腥且令人恐怖的世界。在我看来，公平地说：马克思虽已正确地预见到了残酷的阶级斗争以及戏剧般的革命变迁过程，但他并未预见到事实上已成为本世纪之特征的那种骇人听闻的军事暴力。在现代社会理论领域中，现今所公认的主要奠基者(包括马克斯·韦伯)均没能预见到，当今所爆发出的某些力量会有多么剧烈、多么具有毁灭性。韦伯亲身体验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屠杀，可是，他简直想象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极权主义会如此迅速地接踵而至。同样地，尽管最终造成这种状态的趋势在19世纪就已昭然若揭，而

且还同发动工业化战争的手段的发展不无关联，但却没有人能预见到热核时代的濒临。虽然工业、技术和发动战争的手段的结合已成为总体上的工业化进程的一项最重要特征，但是，社会理论的重要流派却从未对它的重要性给予充分的分析。

在进行了上述的分析之后，我试图在本书的中心内容中探讨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为主的批判见解中将处于何种境地？至少，人们必定会得出如下的结论：我们今日的处境与马克思所预言的未来状态存在着莫大的距离，因为我们可借以逼近这种未来状态的路径几乎并不存在。“历史的辩证运动”显然不会帮助我们这些人类共同体成员来克服我们当今所面临的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撕裂的世界之中，它一边是离奇的机遇，另一边却是大规模的灾难，也只有那些最为愚蠢的乐观者才会假定前者必定会战胜后者。

本书写作的目的是为了以系统的方式勾勒出世界史的粗线条。为了使读者系统地了解它的内容，有必要提前概括我将要论述的论点。我想绝大多数读者都将认为某些论点会引起争议，但同时我又坚信，他们也会发现其他一些论点是富于启发性的。当然，要明了它们的意蕴，就需细读本书，且需时时回顾。

1. 传统国家(阶级分化的社会)的本质特性是它的裂变性(*segmentary*)。其政治中心的行政控制能力如此有限，以至于政治机构中的成员并不进行现代意义上的“统治”。传统国家有边陲(*frontiers*)而无国界(*borders*)。

2. 在绝对主义(*absolutist*)国家中，我们发现了与传统国家这一形态的断裂，这预示着继之而来的民族－国家的发展。自绝对主义(*absolutism*)时代始，与非个人的行政权力观念相联系的主权观念以及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政治理念，就已逐步成为现

代国家的组成部分。

3. 民族 – 国家的发展预设着传统国家中相当基本的城乡关系的消解,同时也内含着(与国界相联系的)高度密集的行政等级的诞生。

4. 从后文所作解释的意义上看,民族 – 国家本质上是多元政治(polyarchic)。它们的多元特征的基点在于(其凭借监控的扩展而达成的)行政集中以及由此而来的业经改变的控制所具有的辩证法特性。

5. 民族 – 国家只存在于与其他民族 – 国家的体系性关系之中。从一开始,民族 – 国家内部的行政调节就仰赖于那些能反思性地予以监控(reflexively monitored)并具有国际特性的条件。“国际关系”与民族 – 国家同时起源。

6. 与传统国家相比,大多数民族 – 国家内部都实现了绥靖,以致于垄断暴力工具通常仅是统治者用以维持其“统治”的间接资源。就此而言,现代国家的军事统治远不同于传统的统治模式。而这一论断在 19 世纪的社会理论所描绘的军事社会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两者的对照中依然有效。

7. 资本主义的扩张对于 16 世纪以来的新兴世界体系的巩固至关重要。尽管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对于民族 – 国家的兴起都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民族 – 国家体系却并不能化约为这两者。现代世界在形成过程中其实受到了资本主义、工业主义以及民族 – 国家体系的交叉影响。

8. 军事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of war)是一个与民族 – 国家兴起相伴的关键过程,也正是它型构了民族 – 国家体系(nation – state system)的轮廓。其后果是创建了一种世界军事秩序,这种秩序实质上是将世界划分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

和“第三世界”。

9. 20世纪跨界的全球交往得以持续迅猛的发展，但本质上这不应被视为国家主权的削弱过程。恰恰相反，它本质上正是当今民族－国家体系在全球范围得以扩张的主要条件。

10. 与现代性相联系的“制度丛结”共有四种：高度监控、资本主义企业、工业生产以及巩固对暴力工具的集中化控制。其中的任何一项均不可完全化约为其他任意三项，对每一项之后果的关注又均会使得批判理论偏离其原有的关注点：资本主义会被未来社会转型之唯一目标的社会主义所超越。

在这里，我应该指出上述论断的性质及适用范围。本书的主旨在于解释，民族－国家在其发源地，亦即“西方”的发展。在最后那总结性三章出现之前的各章中，每当我言及“民族－国家”，读者应明白是指“西方民族－国家”，更多的时候则指“欧洲民族－国家”。在最后三章中，我虽试图追溯这种政治形态如何且出于何种原因成为全球的普遍现象，但我无意于对当今世界之国家间的变异作出穷尽性的分析。

第1章 国家、社会与现代史

权力与支配

自本节的开始部分起,我将勾勒出某些与权力(power)有关的一般性概念,这将有助于从整体上建构起本书的基本主旨。“权力”以及“能动”(agency)和“结构”(structure)均是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1]尽管并非所有的能动者(agents)都是人,但要成为人就意味着成为能动者,而要成为能动者也就要掌握权力。在这种高度抽象的意义上,“权力”即指“改造能力”,这种能力是指能够对一系列既定的事件进行干预以至于通过某种方式来改变它们。就社会理论而言,能动和结构之间的逻辑关联自然最为重要,但为了运用权力概念来进行大量实质性的研究,我们还亟待对这个概念的逻辑关联所隐含的“普遍性意义”加以提炼。

概念提炼主要需要两项工作。一方面,我们必须把权力同资源联系起来。资源是能动者为完成其所做的一切事务而在其活动过程中予以运用的,它们内嵌于社会体系的再生产过程中。由于社会体系具有某种程度的跨时-空的连续性,因而,资源也就“存在于”不同的时-空中并构成它们的社会体系的结构属性。资源可以被分为两类: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配置

性资源指对物质工具的支配,这包括物质产品以及在其生产过程中可予以利用的自然力;而权威性资源则指对人类自身的活动行使支配的手段。^[2]这两类权力的源泉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对时空关系的控制。

在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文献中,在对社会的构成以及对社会变迁所作的解释中,配置性资源时常都会被赋予首要地位。如果历史唯物主义是指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3]中所提供的那种历史解释纲要的话,那么,它就已全面而又直截了当地表述了这一论点。历史唯物主义是根据生产力的增长来解释“历史”,不同类型社会中的制度组织及其变迁过程均导源于这种生产力的增长。不过,这绝不意味着对配置性资源的强调只见于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凡是那些可以被归类为“文化进化论”或“社会进化论”的理论均具有这一特征,这类理论试图依社会形态对其“环境”的不同适应程度来解释社会变迁。我已在其他地方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因而在此重述那种批判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4]根据本书的一贯立场足以指出,在对历史作解释时,我们绝不能以为,配置性资源在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走向另一极端,即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权威性资源上。如果人类历史并不存在原动力,那么,社会分析就是要在社会体系的构成和社会变迁的动态过程中,考察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之间的各种关系。^[5]

无论如何,资源均不会“自主地”纳入社会体系的再生产过程之中,只有当居于情境中的行动者将它们纳入日常的生活行为中时,它们才得以运作。换言之,凡是社会体系,都可以作为

支配(domination)的具体模式或表现形式而给予研究,也正是支配这一概念而非任何其他概念为权力研究提供了焦点。在不同时空中具有某种规定存在方式的社会体系,是由行动者或行动者组成的集体各自的自主性与相互之间的依赖性两者之间的关系构建而成的。因此,它们就总为“权力体系”,或者总是表征为支配形态。^[6]这一点已在有关权力特性的争论中被全面探讨过,因而,在此所描绘的支配形态,就不能被化约为由单个能动者所采取的行动和决策以及由他们所制定出来的政策。权力是那种能用以有效地决定事件发展过程,甚至是决定他人在何处能争夺这种决策权的能力,它具有不可否认的重要性。然而,“决策”和“经过论争的政策”只展现出支配的一个维度。尽管用“未决策”这一术语来指称权力的另一维度并不恰当,但是,在政治学的某些领域中这却已变得相当牢不可破。重要的是,问题不仅在于还没有做出决策,更在于决策甚至从未被考虑过。换言之,把未决策仅仅看成是决策的对立面,并不十分准确。我们还应指出,它影响了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一定的行动过程对各式的“选择”完全是开放的。当权力被当作制裁力量来运用时,它可能令人惊恐万状,而且更多时候也构成最令人畏惧的力量形态;而当它缄默地贯穿于重复不断的制度化实践过程中时,它则通常是最强烈而又最持久的力量形式。^[7]所以,在我使用“支配”一词时,它本质上并非是一个携有负面意义的概念。^[8]

只要是社会体系,不管其存在的时间有多长,就都包含着“权力的制度性调配”(intitutional mediation)。^[9]这就是说,支配存在于制度之中并通过制度展现出来,而又正是制度,使那种深深地内嵌入社会生活的连续性得以呈现出来。可是,在所有的集体情境中,不论社团还是组织,^[10]支配都表现为**控制模式**,

凭借控制,某些能动者致力于实现并维护他人对自己的服从。我将相对稳定的控制形式称为统治(rule)。统治形式(或多或少)是社会体系中自主性和依赖性之间的稳定关系,对它们的维护在于那些居于支配位置者用以左右他人活动的常规实践。就此而言,在分析上,它们独立于权力的制度性调配。^[11]因而就改造能力意义上的权力而言,既定类型的科层组织可能会生产出高水准的权力。比如,根据其所需的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来判断,现代庞大的工业公司确实属于这种组织。可是,任何个人或个人组成的群体对组织运作的控制能力,都并非是已生产出的权力在“量”上的直接延伸。当一个人能够调度一系列资源时,他(她)就可能居于“强有力”的位置上。不过,这些资源能否用来达到个人的权力目的,却要依赖于这个人是否能从他人那里获得一切必要的遵从。^[12]人们经常提及那些居于“重要权力”位置者,说他们在实现自己的目标时面临诸多障碍,这种情况看来并非虚构。

我们应区分开统治的“范围”(scope)和统治的“强度”(intensity)。^[13]前者指居于支配位置的行动者对那些屈从于其统治的人们的重要活动领域的控制程度。行政管理人员对居于较低劳动等级的那些人的控制范围,虽然通常只限于“工作”领域所进行的活动,但可能仍然是相当广泛的。而就控制强度,(即那些能用来获得他人屈从的制裁措施)而言,最极端的形式就是对暴力工具的控制以及对生杀大权的掌管。控制范围和控制强度之间可能存在各种关系,这一点对于本书的主旨来说,至关重要。人们以为,传统的臣民需遵从其众多统治者的每一项命令,否则“违者处死”,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后者对前者拥有“无上”的权力。可是,这种权力绝不会对臣民的行为实施广泛